

罗国杰文集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

(增订本)

罗国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国杰文集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

(增订本)

罗国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罗国杰著. —增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
(罗国杰文集)
ISBN 978-7-300-25358-9

I. ①传… II. ①罗… III. ①伦理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D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2601 号

罗国杰文集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 (增订本)
罗国杰 著
Chuantong Lunli yu Xiandai Shehu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8.7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96 000	定 价	108.00 元

第一版序言



由我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出版后，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把我关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深远影响的思考进行系统的梳理，作为我近 50 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心得与体会的记录。

我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传统道德，自幼就有着特殊的爱好，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道德家等的生平事迹，总是牢记在心，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1960 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开始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工作，这对我来说，更是一个认真学习伦理学的好机会。我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道德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大约有 5 年之久，这个时期，主要是因为承担了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任务，工作期间和业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中国古代先秦两汉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思想家的著作，先后撰写了他们的伦理思想。这一段的学习，使我进一步地认识、了解和领悟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深邃的伦理学思考，使我得出了一个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都有着极其丰富的伦理思想，对伦理学都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爱好，而中国古代的伦理学家们，也都非常善于哲学地思考，即便是在讨论所谓的“形而下”的伦理道德的具体问题时，他们也都没有停止从本体论上探讨这些



问题的根源性。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学同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学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传统道德的第二个阶段，是从 1993 年到 1996 年这近三年的时间。这段时期，由于我接受了主编由当时的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的任务，不得不放弃手头应完成的许多重要任务，包括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集中精力，组织了几乎全国的从事中国伦理学史和传统道德研究的同志，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集思广益，共同撰写了五卷本的《中国传统道德》。如果说，20 世纪 80 年代我对中国伦理思想史学习的重点，主要是先秦和两汉伦理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那么，90 年代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学习，则主要侧重于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以及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优良道德传统。这后一阶段的学习，使我对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全面地观察、把握和运用这些思想，科学地、有分析地、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把握这些思想，为更好地加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了更迫切的要求。

正是由于上述个人的专业兴趣，也因为这个专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才决定，把这些年来有关中国伦理思想和传统道德的思考进行梳理，形成这部著作，也希望自己对于中国伦理思想和传统道德的看法，能够得到专家的指正。

罗国杰

2012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关于中国伦理思想的若干问题	1
第二节 对传统道德批判继承的理论认识和方法原则	37
第二章 以周公“敬德保民”为核心的西周伦理思想	
——《尚书》、《易经》、《诗经》中的伦理思想	51
第一节 《尚书》中所反映的周公的伦理思想	51
第二节 《易经》中的伦理思想	60
第三节 《诗经》中的伦理思想	65
第三章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	69
第一节 孔子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	69
第二节 以“爱人”为核心的社会道德	74
第三节 对孝、忠道德规范的强化	81
第四节 “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论	86
第五节 “君子”、“仁者”和“圣人”的多层次的理想人格	90
第六节 “为政以德”的思想	94
第七节 “先义后利”的义利观	98
第八节 孔子与儒家思想	105
第四章 墨家兼爱和义利并重的伦理思想	131
第一节 墨子的生平及其著作	131



第二节	以“兼爱”为核心的伦理思想	134
第三节	义利并重的原则和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	137
第四节	以反侵略为目的的非攻	141
第五节	“赖其力者生”的劳动创造论	143
第六节	天能赏善罚恶的宗教伦理观	145
第七节	以行为本的道德修养论	148
第八节	尚贤和尚同的政治思想	150
第五章	孟子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其与告子的争论	152
第一节	孟子的生平及其著作	152
第二节	性善论同性无善恶论的对立	153
第三节	良知、良能或良心是道德意识的核心	158
第四节	以性善论和良知论为基础的修养论	162
第五节	重义轻利的动机论	166
第六节	重“良贵”的价值论	169
第七节	五伦关系及其准则的确立	170
第八节	告子“生之谓性”的人性论	173
第六章	道家“自然无为”和“超脱义利”的伦理思想	178
第一节	《老子》“返朴归真”的伦理思想	178
第二节	杨朱“贵己”、“重生”的伦理思想	195
第三节	庄子“超脱义利”的伦理思想	203
第七章	法家“重利贱义”的伦理思想	224
第一节	《管子》中所反映的齐法家的伦理思想	224
第二节	韩非的伦理思想	231
第八章	先秦伦理思想集大成者荀子的伦理思想	242
第一节	荀子的生平	242
第二节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244
第三节	对作为规范体系的“礼”的阐发	248
第四节	“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的政治伦理思想	252
第五节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的义利观	261
第六节	强调“师法”、“礼义”的道德教育论	264
第九章	儒家伦理思想的系统化	269
	——《礼记》、《孝经》中的伦理思想	269

第一节 《礼记》的伦理思想	269
第二节 《孝经》的伦理思想	288
第十章 董仲舒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神学论证	292
第一节 生平及其著作	292
第二节 为什么要“独尊儒术”	293
第三节 天人感应和天赋道德	295
第四节 关于“三纲”、“五常”	297
第五节 “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的人性论	300
第六节 “正谊”、“明道”的动机论	302
第七节 “利以养体”、“义以养心”的义利观	304
第十一章 儒家伦理规范体系的完善及其正统地位的确立 ——白虎观会议	306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原因	306
第二节 白虎观会议和谶纬神学	309
第三节 “三纲”、“五常”的正统地位的确立	310
第四节 白虎观会议的意义	317
第十二章 对神学伦理思想的批判	318
第一节 扬雄的伦理思想	318
第二节 王充的伦理思想	322
第三节 王符的伦理思想	333
第十三章 宋明时期的伦理思想	337
第一节 陆九渊的伦理思想	337
第二节 王守仁的伦理思想	351
第三节 宋代思想家对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	365
第四节 李贽伦理思想新探	370
第五节 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及其在道德修养上的 重要意义	382
第十四章 传统伦理与道德建设	391
第一节 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	391
第二节 传统道德与当代道德建设	416
第三节 传统文化与人才培养	428
第四节 传统美德举要	438



第十五章 道德建设与治国兴邦	470
第一节 儒家的德治思想	470
第二节 “法治”和“德治”应当相辅相成	476
第三节 道德建设与治国兴邦	485
第四节 关于“以德治国”的几个问题	489
第五节 论“以德治国”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503
第六节 “以德治国”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517

附 录

中国传统伦理教育的分析	527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534
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思考	538
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548
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未来价值取向	557
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寿终正寝”吗	562
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传统	
——关于怎样正确对待传统道德的一点思考	569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传统文化	574
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	581
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591
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气功论述的分析	600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关于中国伦理思想的若干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因而比世界其他各国具有更加丰富而别具特色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从不同角度反映着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状况，表现着思想家们不同的伦理思想。今天，在世界科技革命潮流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和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不仅对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改善社会风气，进而推动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伦理思想史是关于各种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产生、发展、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都是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根源上来说，它们都来源于人类社会



生活，是人们对自身道德关系的反思；但伦理学说比较深刻、全面，有一定的理论体系，而道德观念则比较简单、零碎，多散见于历史叙述、文艺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中。

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不能简单地罗列各种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而是要进一步寻找其中固有的必然联系，考察这些观念和学说是如何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即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斗争、彼此影响、相互吸收、前后承袭的，及其逻辑的、必然的发展轨迹。一部伦理思想史，不仅应当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要有鲜明的伦理学特色，要能够详细地反映出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在历史进程中相互斗争、相互吸收、前后相承、不断发展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伦理思想一直同哲学、文学、宗教、历史、政治、法律等思想融为一体。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学术一直以经、史、子、集分类，而未形成相对明确的学科划分，也不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伦理学学科。尽管经、史、子、集中的不少内容，都深刻地论述了有关人生价值、人性善恶、道德原则和品德陶冶的各个方面，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始终没有以“道德学”或“伦理学”命名的专著。《论语》和《孟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伦理学史上最早的两部伦理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社会政治思想。朱熹的《小学》可以算是一本道德教育专著（他自称这本书是要回答“做人的样子”这个问题的）。宋明以后，学术思想在总体上更加倾向于探讨如何做人的问题（即如何“成贤成圣”），或者由探讨如何做人人手研究如何治世，哲学越来越伦理学化，理学家著作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也都服从于伦理学。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理学研究的内容就是道德，但这种道德理论仍然同政治和哲学等结合在一起。虽然《礼记》中就出现过“伦理”这一概念，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却未能建立起专属于伦理学的术语和范畴。1910 年前后，刘师培参照西方伦理学著作，结合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写成《伦理学教科书》，但依旧不成体系。而西方却早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即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的伦理学体系。中国是一个以文明礼仪著称于世的国家，伦理思想一直同各种思想融为一体，在学科上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这是同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相联系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

想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个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难度。如果不能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挖掘、探索和剥离出各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乎内在逻辑的中国伦理思想的框架体系,我们就不能在这一领域内取得重大的成果。除了从所谓的“经”、“史”、“子”、“集”中,从众多的中国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来研究以外,还必须从我国的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以及政治、法律著作中来探讨和总结中国伦理思想。

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还要特别注意它同中国哲学史的区别和联系。哲学史是人们对于整个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的历史,对它的研究是为了汲取人类认识史的经验教训,阐明和发扬真理。伦理思想史是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关系和社会道德现象的认识的历史,它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研究对象不同、重点不同,结论有时也不同。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因而在认识论上往往会混淆、抹杀以致颠倒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但中国伦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内容。如果只看到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共同点,而看不到其不同点,就势必会把哲学史的框框套到伦理思想史上,从而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同样,如果只强调二者的区别而看不到它们的联系,使伦理思想完全同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割裂开来,则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两种倾向对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有害的,应该避免。如果只是从哲学史中孤立地摘取某些思想家们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思想,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就以为掌握了中国伦理思想史,这种想法当然也是错误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必须揭示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规律,揭示每一个伦理思想家的思想结构体系和理论贡献,特别是要对每一种伦理思想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等,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区别,我们试举几例加以说明。比如,陆王心学非常强调“心”的重要作用。从认识论上来看,由于他们否认了客观世界是人们认识的来源,因而在认识过程中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果。但是,强调“心”的作用,在伦理学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的。伦理学研究的重要的道德现象之一就是“良心”,从伦理学的研究来看,人们至今还没有揭示出“心”即人的“良心”的深奥微妙。良心是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英国 18 世纪著名的伦

理学家巴特勒认为，伦理学应该从良心开始研究，没有良心就无法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德国著名的伦理学家费尔巴哈的幸福论亦用很大力量来解释良心。中国伦理学家们也以极大工夫来研究良心或本心。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来看，确实在某些时候是把认识和实践混为一体，但是实际上，他提出这个命题的“立言宗旨”不是要讨论哲学问题，而是要探讨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懂得他的“立言宗旨”，即一个人要有道德，必须言行一致。如“知孝”必须与“行孝”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知孝”。再如，孟子讲的养“浩然之气”，也不能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至大至刚”、可以“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是通过了解“义理”，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而形成的一种无愧无怍、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堂堂正气培育了后世无数的民族英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必须注意伦理学的概念、范畴同一般哲学范畴的联系与区别，注意一个命题所具有的伦理意义与一般哲学意义的联系与区别。同时，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很多问题，要注意其“立言宗旨”，并从伦理学角度来考察，不能用哲学结论来套伦理思想史。

学习和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还必须特别注意，要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来考察中国的情况，在同世界各国伦理思想的比较中探索、概括中国伦理思想的民族特点，并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厘清其中的糟粕和精华。这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现在和未来。

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但是，什么是中国特色？很多方面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特别强调，要在研究中注意中华民族的特殊的独有的道德传统、民族习俗和民族心理，通过中西比较揭示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①这里所说的善恶观念，实际上可以看作伦理思想的总称。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对善恶的特殊理解和把握。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比较多地注意到不同时代善恶观念的差别，注意到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善恶观念的不同，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从历史发展、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33～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级区分来研究历史上的伦理学说、道德观念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的民族特性，这就是片面的了。

我们知道，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尽管每一个民族大体上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每个社会、每个阶级都可能大体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思想，但是，各民族都有其特殊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心理素质和传统习惯，因而也就形成了特殊的民族道德。中国传统道德和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研究、总结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伦理思想的特殊性及其发展规律，是我们学习中国伦理思想史所必须特别注意的。

近年来人们强调中西伦理思想比较，表现出了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扩大。确实，不了解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理论，就不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概括和总结中国的伦理思想。因此，通过中西伦理思想史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伦理思想的特点和价值。但是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必须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伦理传统出发，采取历史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而不能采取褒西贬中、崇洋媚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在比较中，既要看到中国伦理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可避免地有着维护封建统治、束缚个性的方面，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富有生命力的精华。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准确、更完整、更全面地概括我国伦理思想的规范、范畴及其特点，以期建构起富有民族特色的，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伦理学体系。

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分期

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分期^①，本书根据中国伦理思想产生、发

^① 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们采取战国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白寿彝、吴大琨、杨宽、田昌五等，其理论依据参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此说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化时期。关于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本书认为明末清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展、演变的历史特点和逻辑规律，大体上将其划分为八个时期：殷商至春秋，春秋战国至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北宋至明中叶，明中叶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一个时期，即殷商至春秋的前孔子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发端期。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对这个时期的伦理思想还研究得很不够。

第二个时期，即春秋战国至秦。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伦理思想奠基和形成的时期，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即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是封建伦理思想的系统化及其统治地位进一步确立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即魏晋至隋唐。这一时期是封建伦理思想的演变时期，包括玄学伦理思想对封建正统伦理思想的冲击以及儒、道、佛伦理思想的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

第五个时期，即北宋至明中叶。这一时期是封建伦理思想的深化和成熟时期。

第六个时期，即明中叶至鸦片战争。这一时期是封建伦理思想的衰落和近代早期启蒙伦理思想的萌芽时期。

第七个时期，即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第八个时期，即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以及同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斗争的时期。

三、中国伦理思想家们研究的主要问题

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特殊条件，形成了中国的思想家们对道德思考的特别兴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就其起源来说，就与古希腊不同。它不执着于探索世界万物的起源，不过分寻求人们自身的享乐，而是以其特有的精神，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索道德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伦理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就强调“以德配天”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公义，反对私利，强调仁爱，重视诚敬，从个体道德修养入手，以一定的规范体系作为人们所必须遵循的戒律，寻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国伦理思想家们所涉及的问题，

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 道德原则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 简称道德同利益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道德同利益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道德的根源、本质、社会作用和发展规律的问题。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对此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 他们不同程度地揭示了道德对人们物质生活的依赖, 把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提高人民道德水平的基础。如管仲说: “仓廩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孔子一方面主张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 即根据老百姓的要求, 使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能够尽可能地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又强调, 在老百姓富庶之后, 还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孔子所说的教育, 就其主要内容来说, 就是一种道德感化。韩非认为: “饥岁之春, 幼弟不饱; 穰岁之秋, 疏客必食。非疏骨肉, 爱过客也, 多少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 王充又进一步作了发展, 认为: “让生于有余, 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 礼义之心生; 礼丰义重, 平安之基立矣。”“为善恶之行, 不在人质性, 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 礼义之行, 在谷足也。”(《论衡·治期》) 这些思想都从不同的方面, 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的关系, 有着合理的因素。当然, 如果只是把人们的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机械地联系起来, 还不是辩证的和科学的, 但比起那些把道德的根源归于理性、上帝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说, 则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道德同利益的关系的第二个方面, 主要涉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决定着某一道德体系的道德规范的原则、道德价值的标准、道德活动的方向和方法。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 先秦时期关于这个问题出现过义利之争, 儒、墨、道、法等家, 各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观。儒家重义轻利, 把义利之分看作评价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标准, 强调道德的重要性, 轻视“利”的作用。在儒家看来, “义”主要是指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 “利”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说: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孟子把利和恶等同起来, 把义和善等同起来, 认为: “鸡鸣而起, 孳孳为善者, 舜之徒也; 鸡鸣而起, 孳孳为利者, 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 无



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是一种义利并重的思想。墨子明确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同时又指出“义，利也”（《墨子·经上》），把广大小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最大的义。法家重利轻义，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有“自为心”，因此，统治阶级要善于利用人们的这种自私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儒、墨、法三家不同，道家则是义利全抛，超越利益和道德，反对儒、墨、法三家的义利之争。到了宋明时代，义利之争又演变为理欲之辨。“天理”、“理”往往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看作“公”，是最高的道德，而把人欲和私欲看成最大的私，是与道德不相容的。正是在这种理论前提下，道学家才提出了所谓要“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清代中期反理学的思想家戴震认为，“理存于欲中”，“善源于欲内”，从而提出了“欲既不可去，亦不可穷，而应当节”的理论。由于古代思想家对于“欲”的含义没有确切的界说，因而引起很大争论。理欲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个人幸福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牵涉到更广泛的方面，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独特的方式。

（二）道德的最高理想问题

道德的最高理想就是人生的最高准则，也可以说是人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把“仁”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墨子把“兼爱”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老庄把“无为”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中庸》把“诚”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在他们看来，只要实现了道德的最高理想，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圣人”、“仁人”、“至人”、“真人”。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家们认为，人们为学的目的就在于变化气质，陶冶性情，以便最终成为圣人或真人。道德的最高理想和道德的最高原则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伦理学说体系的核心。

（三）人性问题

这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几乎所有重要的伦理思想家，都对人性问题进行过研究。人性问题，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性的主导倾向或性质是怎样的？就是说，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人性是普遍相同的，还是分品的？中国伦理思想家们之所以特别注意研究人性问题，主要同他们特别注意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有关。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是对人之所以异